

《大运河上的旅行者》的学术拓展与文化重塑

流动的文明史



得以发声。

该书的另一重要学术贡献在于其对大运河空间特质的深刻把握。作者没有将运河简单理解为一条线性的水道,而是将其阐释为一个充满节点与片段的复杂空间系统。书中精辟分析了运河沿线的关键节点——码头、闸坝、城镇、客栈——如何成为社会交往与文化融合的场所,同时也揭示了旅行者在运河上的体验本质上是片段化的,由一系列短暂停留与不断启程构成。这种空间理解打破了将运河视为均质通道的简化观点,展现了大运河作为文化空间的丰富层次与内在差异。

通过旅行者的眼光,该书成功重构了大运河作为帝国血脉与文化熔炉的双重角色。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旅行者在运河上的相遇与交流,使大运河成为各种文化元素碰撞融合的动态场域。书中细致描绘了南北风俗如何通过运河旅行相互影响,官绅文化与市井生活如何在运河空间中互动,甚至中外观念如何通过这条水道进行初步交流。这种文化熔炉的视角,使我们得以超越大运河的物质功能,深入理解其在中国文化形成与传播中的核心作用。

在全球史视野下,《大运河上的旅行者》也将中国的大运河置于世界运河体系中进行比较考察。书中通过将中国大运河与欧洲运河、中东古运河进行横向对比,揭示了大运河作为文化通道的独特性质。同时,通过对来华西方旅行者运河书写的分析,展现了大运河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前沿的重要地位。这种跨文化比较不仅丰富了大运河研究的内涵,也使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得以参与全球历史对话。

尤为难得的是,该书并未将旅行者群体视为同质化的整体,而是敏锐地揭示了旅行体验中的阶层差异与身份政治。官员的舒适航程与普通旅客的拥挤困顿,文人的审美抒怀与外国使节的细致观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旅行条件的不平等,更折射出帝制中国社会的层级结构与权力关系。通过分析不同社会地位旅行者的运河经历,该书实际上进行了一场关于前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微观解剖。

《大运河上的旅行者》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其对记忆与遗产的深刻思考上。书中追溯了不同时代的旅行者如何记忆、书写并传承他们的运河体验,这些记忆又如何层层累积,构成了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这种对记忆形成过程的关注,使该书超越了单纯的历史重构,而上升到对文化遗产本质的哲学思考,为当下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阐释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与理论支撑。

综上,《大运河上的旅行者》以其视角转换、方法创新、史料拓展与理论深度,成为大运河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学术力作。它不仅填补了旅行者视角下大运河文化史的研究空白,更通过这条流动的文明史,为我们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运作、文化融合与空间实践提供了全新图景。在这个意义上,该书的价值已超越单纯的运河研究,而成为探索中国历史与文化特质的重要窗口。当我们目光从帝王将相转向那些在运河上流动的普通旅人,从政治事件转向日常的旅行实践,历史的图景便焕发出前所未有的丰富与生动,这正是《大运河上的旅行者》留给我们的最宝贵学术财富。

《大运河上的旅行者》对史料的开掘与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作者不满足于常见的名家游记,而是苦心搜求各类罕见文献,包括历代文人笔记中的运河诗作、外国使节的沿途考察日记、传教士书信中对中国内河交通的描述等。这种史料拓展不仅丰富了历史细节,更使那些长期被主流历史叙事忽略的群体

大地美学的诗性重构

——谭登坤《大地的隐语》解读

■ 王志峰

走进谭登坤老师笔下那片丰饶而充满哲思的文学原野,我感到非常高兴。

《大地的隐语》我从头到尾认真读完了,有些章节还不只读了一遍。在开始解读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个许多人都有过的体验:就是每到春天,看见第一抹鹅黄,或者第一缕青绿的时候,你是不是心底会颤动一下?或者上班累了,一抬头望见窗外的树上落了一只鸟,你是不是也会心动一下?还有劳累了一天,下班回到家里,忽然发现窗台上的一盆花开了,你是不是依然会心动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些悸动就是我们沉睡已久的、和大地血脉相连的记忆在复活,好多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自己和自然、和大地的联系。谭登坤老师的《大地的隐语》,正是一部系统而深情地唤醒这份记忆的作品。它不仅是一部散文集,也是一部当代人尝试与自然和解、寻找精神原乡的作品,更以其鲜明的文学自觉、深邃的生态哲思与独特的文体实践,为当代散文,特别是生态文学写作,提供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范本。

下面我简单分享几点认识:

一、诗性重构与“大地美学”的文学确立

《大地的隐语》在文学审美层面上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升华,它成功地将隶属于自然科学和环保议题的生态概念,彻底地、精美地文学化了。现在好多人的生态文学散文,还停留在纪实写作的层面,没有上升到文学层面。但是谭登坤老师,他的生态文学文本肯定是散文,并且是精美的散文。他没有停留在现象描述上,情绪抒怀上,而是构建了一套大地美学体系。这套美学的核心在于感官的诗性重构。

在谭登坤老师笔下,自然万物被赋予了全新的文学感知。比如文章中写麻雀在雪地上的足迹,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痕迹,而是线条硬朗、质地严谨的书法作品;藤蔓的攀缘,则是一场充满辨别、选择、试探的智慧探索;种子与土地的相遇,则是以它们自己能懂的方式传递的隐语。这些书写,不仅仅是一种拟人化的修饰,更是一种现象学的直观。他尝试选择人类固有的知识、框架,让事物以其本然的方式和语言陈述自身。他让读者看见了风的速度,听见了光的流淌,触摸到时间的形状。这种极致细腻与高度诗化的感性表达,使得“大地”本身从一个地理和生态概念,蜕变成一个充盈的、可能的文学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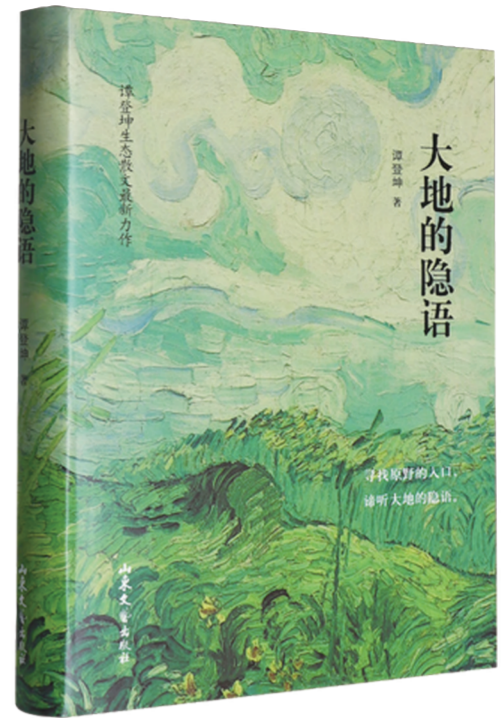
更进一步说,谭登坤老师的美学构建体现出一种微观史诗的伟大追求。它不仅从微观反映宏观,写一粒种子、一只蚂蚁、一道划痕,而是从中透视出生命宇宙的庄严法则。这些让我们想到,古代的一些生态文论中,也有这样的描述,像“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观照方式,这样看来,谭登坤老师的作品跟古代的生态哲学是一脉相承的。这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笔力,标志着谭登坤老师具有个人标识的成熟文学风格的形成。

二、文化根脉与“新山水精神”的当代接续

从文学史的脉络来看,《大地的隐语》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该作品深深植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自然文学传统,却又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新山水精神”在当代散文中的重要收获。

中国的文学传统中,自然从来不只是背景板。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再到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自始至终,都是作者安放身心、寄托理想,叩问天道的镜像。谭登坤老师的写作,无疑接续了这一精神血脉。从更广的层面上来看,谭登坤老师代表的是人类,是人类跟生物、跟万事万物的对话,如书中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跟那棵老朴树的对话,还有在河边上跟老鳖的对话,这些都是千年以来“物我交融”文化心理原型的当代显现。

但是,他在继承古人山水精神的同时,又进行了清醒而痛切的现代性反思。古典山水文学中的自然都是文人超脱尘世的精神乌托邦,物我关系总体是和谐的、审美化的。但是在《大地的隐语》中,这种关系出现了巨大的裂隙。作者敏锐地捕捉并放大了“我”与万物之间的隔膜感,坦诚“丢失了钥匙”的恐慌,并痛陈人类截断河流、毒化土地的罪孽。谭登坤老师在作品中,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对自然对大地有太多不了解的



人。其实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本身就是一个学渣。也就是说,人类跟别的动物之间,应该有很好的交流与了解,但实际上,人类对万物了解得太少了。之所以用“学渣”来比喻,是因为人类好像没有想潜心成为“学霸”的意识,没有潜心地把自然宇宙研究好的意识。对于大地而言,人类对其他生灵的了解,并不比它们彼此之间的了解更深——甚至可以说,人类恰恰是最无知的。因此,谭登坤老师描述现在工业文明扩张带来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的精神困境时,其文字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批判精神。

谭登坤老师的写作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不是模仿古代那种生态自然写作方式,而是带着现代创伤的重返,他试图在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资源中,寻找疗愈现代病的药方。《大地的隐语》除了有陶渊明诗意的栖居,还有抗拒式的警醒,挽救脆弱家园的自觉。这种双重性赋予了作品厚重的时代张力和思想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探索一种新山水精神的创作方式。

三、文体跨界与生态散文的范式意义

作为一名文学期刊编辑,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大地的隐语》在文体探索上有重要的贡献。它有效地打破了散文书写的固有边界,为生态散文这一亚文类的范式建立,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方案。

第一,《大地的隐语》是“博物志”的科学精神与文学抒情的融合。书中对数百种动植物细致入微的描写,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自然观察功力,近乎一部齐鲁平原微观“博物志”。从谭登坤老师的作品中能深切地体会到,尽管他写的是动物,写的是河流、鸟、虫,但是从根源上,我们看到他写的是马颊河,写的是鲁西平原,字里行间均能看到他自己和家乡的影子。因此这部“博物志”不是科普类的、技术类的,它是用散文的手法来写的,这里知识成了诗意的基石,而非诗意的装饰。这种融合保证了文本的坚实可信,避免了枯燥的科普讲解。

谭登坤老师写作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文笔特别优美。谭老师说过,谭老师像一头牛,一棵树,一蓬草,但是他的文字却是非常唯美。假如不认识谭登坤老师,读他的散文,读到某些地方的时候,会觉得作者是一名纯情女子,在大自然间非常细致入微地观察一切,并且发自内心地发出一些思想和感悟。我觉得作品中的许多句子,写得非常优美,整本书就是一部美文散文。

其次,《大地的隐语》有着“深思熟虑”式的哲学品格与叙事张力。全书充满形而上的追问,存在与感知、语言与沉默、时间与记忆、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但它并未堕入抽象的玄学空谈。这些沉思牢牢附着于“五岁的孩童”“十五岁的少年”,还有“大雁南飞的阵形”,他用具体而生动的生命叙事,让文章有了体温,故事有了灵魂。另外,我觉得书中有许多非常有哲理的语言,可以作为名言警句来体悟,这也是作品的一个特点。

第三,《大地的隐语》有着“寓言体”的象征架构与现实主义底色的交织。整体上来说,作品是一部关于失落与寻找,背叛与救赎的现代寓言。但是,这个寓言真实地建立在极其真实鲜活的乡土现实之上。它不是我们以前读过的人为编织的寓言,它是扎扎实实建立在马颊河、鲁西平原重重烟火气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现代人类生存节奏之上的。《大地的隐语》这种文体的“混血”与“跨界”,使得它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文本肌理,可读,可思,可品。它昭示着优秀的生态文学完全可以追求这种“复合性”的文体构架,从而承载起同样复杂紧迫的时代使命。

四、对当下及未来生态文学的期待

首先,呼唤更自觉的文体意识。生态写作应警惕沦为单纯题材意义上的环保宣传品或田园抒情诗。它必须首先是优秀的文学,需要在语言、结构、意象、思想等各个文学维度上追求卓越。《大地的隐语》的成功,根本在于其强大的文学性。

其次,期待更深层的文化开掘。中国的生态文学理应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面孔和精神气质。如何将古老的东方生态智慧,如生生之德、天人合一、众生平等理念跟文学结合,并且有所发展,有所开拓,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大地的隐语》在这方面已经有所探索,值得进行更深入的挖掘。

最后,提倡更复杂的现实观照。生态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环境问题,它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城乡关系等深刻纠缠。未来的生态文学,需要更大的野心和笔力去呈现这种复杂性,写出生态危机背后的人性危机,写出大地上具体的人的命运和选择。

谭登坤老师的《大地的隐语》如一枚石子投入当代文坛,它所激起的涟漪远不止于一部好书的赞赏。它让我们看到,散文这种古老的文体依然拥有回应最紧迫时代课题的巨大潜能,它让我们相信,对大地深沉的爱,完全可以转化为高贵而动人的文学篇章。

